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中國大陸問題座談會：當前鄧胡政權推展「全面改革」的探討

doi:10.30390/ISC.198304_22(7).0005

問題與研究, 22(7), 1983

Wenti Yu Yanjiu, 22(7), 1983

作者/Author：中國大陸組;經濟組

頁數/Page： 40-67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83/04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304_22\(7\).0005](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304_22(7).0005)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中國大陸問題座談會紀要

本中心
中國大陸組
經濟組

- 一、討論主題：當前鄧胡政權推展「全面改革」的探討
- 二、主辦單位：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 三、時間：七十二年四月一日下午三時至六時
- 四、地點：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綜合研討室
- 五、出席人員：

(一) 邀請出席人員(姓氏筆劃爲序)：

- 王章陵先生：臺灣大學副教授
李天民先生：師範大學教授
玄 默先生：文化大學教授
洪幼樵先生：文化大學教授
范植元先生：「中共研究」雜誌社研究員
徐炳德先生：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姚孟軒先生：臺灣大學教授
張念鎮先生：政治作戰學校教授
陳力生先生：「中國大陸」月刊發行人、成功大學副教授

- 陳定中先生：臺灣大學副教授
陳雨晨先生：中國大陸問題專家
陳森文先生：師範大學教授
陳濟民先生：成功大學教授
曾永賢先生：臺灣大學副教授
裘孔淵先生：臺灣大學教授
趙先運先生：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趙育申先生：東吳大學副教授
趙洪慈先生：政治大學副教授

(二) 本中心參加人員：

- 張京育先生
曹伯一先生
張鎮邦先生
邢國強先生
張競立先生
葉章美女士
方 山女士
江振昌先生

- 趙 倩先生
鄧辛未先生
操樺青先生
吳安家先生
方雪純先生
汪學文先生
王玲玲女士
周玉山先生

李晉鑫先生

張鈞先生

熊自健先生

六、主席（曹伯一先生）報告：

今天是一盛會，我們將藉著這次會議，從不同的角度來探討中共的全面改革。中共政權三十年，今天必須進行大規模「改革」，有其不得然的背景，也有其無可避免的困難，今後究竟會有何種演變？這些都是我們共同關注之處。預擬了一個提綱，但提綱以外可討論處仍多，歡迎各位指教。提綱如下：

一、中共實施全面改革的背景

二、中共實施全面改革的內容

（一）機構的改革

（二）經濟體制的改革（農業、工業、商業及其他）

（三）文教科研體制的改革

（四）其他體制的改革

三、中共實施全面改革的阻力

四、中共實施全面改革的評估

以這一提綱為依據，約請了張鎮邦先生等五位引言人，現在先請引言人提供高見。

七、引言人報告：

（一）張鎮邦先生：農業生產責任制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

今年三月十三日，中共召開了一個萬人大會，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週年，由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作題為「馬克思主義偉大真理的光芒照耀我們前進」的長篇報告。胡的報告，特別提到現在作為中共展開全面改革的動力的農業聯產承包責任制。因此，我願意結合胡的報告，談一談這一個問題，希望起一點拋磚引玉的作用。

中共現在實施的所謂全面改革，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機構改革；二是經濟體制的改革。關於前者，等下有學者專家提出詳細報告，這裏我略而不談。關於後者，最近中共津津樂道並大肆吹噓的就是農業聯產承包責任制。據中共自己報導，自從這幾年實行了以「包產到戶」或「包乾到戶」為主的農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後，由於產量的提高與農民收入的普遍增加，業已為農業打開了新局面。我們知道，中共統治大陸三十多年，在經濟方面以農業搞得最糟，以致八億人種田還解決不了十億人的吃飯問

許光泰先生

張雅君女士

魏艾先生

張虎先生

張欣南先生

陳永生女士

蕭真美女士

題。這就迫使中共不得不向現實低頭，而把毛澤東曾經批判為修正主義路線的「三自一包」重新拿來實施。而所謂「三自一包」，就是中共把土地分給農民耕種，農民向中共繳納一定數額的農產品，剩下的歸農民所有。它在本質上和中國傳統的租佃制度是沒有什麼不同，只是中共取代了過去地主的地位而已。因而有人指出，這種責任制的推行，並不表示中共推行了什麼好的政策，而只是中共比過去減少了對農民的控制和干預，讓農民有較多的生產經營的自由。在農民的眼中，這是復舊，而不是創新，所以他們說：「辛辛苦苦搞了三十年，一個夜晚回到解放前。」而中共黨內一部份反鄧的人，却進一步提出，這是不是由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倒退。對於這一個理論問題，鄧派必須作出答覆，胡在他的報告中特別提到這個問題，就是要在這個問題上為自己辯護。

胡耀邦的報告既然是為了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週年，他就無法迴避對過去三十多年的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作出評估。但要評估過去三十多年的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共實在有難言之隱。所以胡在指出二次大戰後的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經過三十多年的曲折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和勝利，但也有嚴重的挫折和失敗，經歷了充滿動盪和分化的令人目眩神迷之後，對於勝利和挫折的具體情況一概略而不談，就直接作出他對整個問題的一個原則性結論。他說：一切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和一切有識之士，從這種曲折發展中，看到一個最本質的東西，就是越來越多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和組織，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敢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獨立思考，從而能夠獨立自主地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本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所以，馬克思主義發展歷史的一條根本經驗，就是各國黨要根據自己的實際，自己所處的國際環境和國內情況，自己決定自己的路線和政策。革命也好，建設也好，才能取得成功。從這裏我們看得很清楚，胡提出這一點，乃在為自己在理論上尋找一條出路。因為前面曾經提出，農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業已引起這樣一個問題：這樣做是不是由社會主義倒退回資本主義？

現在讓我們來看一看中共怎樣為它的農業新體制辯護。胡說：我們在農業體制上，堅決衝破了長期存在的關於什麼是社會主義公有制，什麼是大生產等問題上的嚴重錯誤，克服了吃「大鍋飯」的平均主義的嚴重錯誤，以專業承包、聯產計酬為特點的農業生產責任制形式，在廣大農村按照中國的具體情況，真正實現馬克思主義的按勞分配原則，真正實現國家、集體、個人利益相結合的原則，這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局，已經並將繼續起巨大的推進作用。胡並進而指出，同那些一知半解的人們的看法相反，社會主義在中國農村不是後退了，而是大大前進了，不是動搖了，而是大大鞏固了。原因不是別的，只在於我們拋棄了從外國搬來的或者自己生造的那些不適合實際情況的舊形式，找到了真正在中國土壤上產生的適合當前中國農村條件的新形式。胡的這些話，正好說明過去三十多年中共在大陸農村所搞的那一套是徹底失敗了。但它現在所搞的那一套是否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却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理論的困境反映了現實的困境。中共一再強調農業聯產承包責任制對全面改革所引起的推動作用。但是恰恰在這個問題上，

我們看到中共是處於理論的困境與現實的困境之中。

(二) 裘孔淵先生：中共的「機構改革」

機構改革的意義——中共的機構改革，廣義的解釋，其內容應該有五：①黨政領導體制改革；②經濟體制改革；③機構精簡；④領導幹部「四化」（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⑤整頓黨風。狹義的解釋，則只是上述③、④兩項。

黨政領導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構想的條文化，已見諸於中共的新黨章、新偽憲法，其中偽中央一級政權體制改革的完成，尚須待偽六屆「人大」會議的召開；經濟體制的改革正在逐步進行。

機構精簡和依「四化」原則調整領導幹部兩項，偽國務院機構部份已於去（一九八二）年上半年實施；省及地、市兩級目前正在進行，縣、社兩級有待今冬明春實施。

今天本人是就狹義的範圍來作引言報告。

機構改革的由來——中共實施長達三十多年的官僚特權專政統治結果，呈現了機構臃腫龐大、幹部老化低能、官僚主義深重、行政效率缺乏等病象。鄧小平一派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獲得權力以後，發現如不設法革除這些病象，不僅無法適應實現「四個現代化」建設的需要，而且已面臨「亡黨亡國」的命運。所以，鄧小平於一九八〇年一月北平萬人幹部大會上作「關於目前形勢和任務」的報告，首先提出改革對於「四個現代化」的重要性。同年八月，他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講話中，發表對全面改革的構想，這一構想，在同年秋被鄧派理論家具體化為所謂「庚申改革方案」；十二月，鄧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重申「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決心。

但鄧派鼓吹和着手黨政改革，其內部歧見和所遭受的阻力甚為巨大。必待審判了林、江集團、通過了批毛保毛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先後逼迫華國鋒讓出偽國務院總理暨中共中央主席職位，並且鄧派自身也作出了若干讓步妥協以後，方始勉強能夠完成修改黨章、通過新偽憲法。

中共「十二大」提出了要實現「翻兩番」戰略目標的「四項重要政治保證」，其首項就是「機構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此後，對機構改革的鼓吹步調加速，今年元旦「人民日報」社論與趙紫陽的春節講話，都指出了今年的工作重點，一是完成省（市、自治區）及地、市級的機構改革，一是進行經濟管理體制改革和調整。

機構改革的實施——據「紅旗」雜誌編輯部文章透露，中共的中央一級黨政機關機構改革，第一階段工作於一九八二年上半年完成，偽國務院所屬部、委、直屬機構和辦公室機構，已由一百個裁併為六十個，工作人員減少了三分之一。據三十八個部、委的統計，正副部長、主任共減少了百分之六十七。新的領導班子中，中青年幹部佔百分之三十二，平均年齡下降了六歲。偽國務院本身，副總理由十三人減少為二人，但新設副總理級的「國務委員」十人。中共中央直屬單位，局級機構減少了百分之十一

，人員編制縮減了百分之十七點三，各部、委正副職減少了百分之十五點七，新的領導班子中，中青年幹部佔百分之十六，平均年齡下降了四歲。

自中共「十二大」閉幕後，省（市、自治區）和地、市兩級黨委的機構改革就着手策劃，陝西、四川兩省省委首先於去（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完成，其餘省、市、區也分別實施，本年三月加速進行，迄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在二十九個省、市、區級黨委之中，已有二十五個宣布完成領導機構的改組，預計在四月底以前可以全部完成，以配合五、六月間召開偽六屆「人大」，依據新的偽憲法改革偽政權體制與調整人事。地、市一級的機構改革也即將展開；縣、社兩級將在今冬明春實施。

按照中共的主觀期望，機構改革的直接目標是要達成機構的精簡與領導幹部的調整，使幹部符合「四化」原則。依中共中央規定，在年齡結構上，省（市、自治區）級領導班子中，五十五歲以下的應佔一定的比例；在文化程度結構上，要求選拔大專程度幹部，並且吸收專家內行，省委常委和行政領導班子中要有熟悉工業、農業、文化、教育、科技、經營管理、財貿等各方面的人才。

就已公布改組的二十五個省（市、自治區）級黨委會機構改革領導班子資料以觀，平均年齡已普遍降低，其中最高者平均年齡五十八點八歲（山西），最低者五十一點三歲（西藏）；知識分子與專家進入領導機構人數增加，如浙江省委副書記吳敏達（五四）為浙大副教授、實驗工廠總廠長；廣東省委常委彭士祿（五八）為核子電力專家；上海市委常委吳邦國（四一）為測量儀器技師；山西省委常委王森浩（五〇）為煤炭工業專家；天津市委常委劉曾坤（五九）為天津市化工局局長、高級工程師，王旭東（三七）為電子工業部第十八研究所所長、助理工程師。

但省（市、自治區）級黨委機構的改革與人事改組，也顯示了相當混亂，一是組織形態複雜，無一定編制，有設第一書記、書記者，有設第一書記、副書記者，有不設第一書記僅設書記、副書記者，而書記又有一人與多人之分。二是改組方式不一，有所謂「民主推薦、反覆醞釀、考察比較、中央批准」者；有「經縣、團級以上黨員幹部無記名投票民主提名、組織部門考察、中央批准」者；一般都只說「經中共中央批准」，而不是全部經由省委全體會議依公平合法選舉所產生。據知，各省調整領導班子的工作，事實上是在由鄧派以中共中央名義派出的「工作組」之手。

機構改革的問題——機構改革，涉及了幾百萬中共大、中、小幹部的「鐵飯碗」與特權，它所遭遇的抗力之大，可想而知。鄧小平也預估到會發生「示威」、「打黑槍」等問題。所以，地方的機構改革將不會如中央一級順利。

根據初步資料，中共實施機構改革過程中所產生的問題，至少已有如下七項：①「五種人」抗拒。機構改革中要淘汰的對象是所謂「五種人」。其中，「三種人」已發現「藉機興風作浪，到處活動，搞名堂，鬧翻案，妄圖東山再起，捲土重來。」另「兩種人」以年老體衰的老幹部為主，他們多數自恃經驗與貢獻，懷抱戀棧心理，不願退位交權。②多數消極觀望。多數人是「上

不沾天、下不沾地」的所謂「觀潮派」，對改革缺乏信心，甚至擔心是走「回頭路」、再犯「路線錯誤」，是「復辟」。有的藉口要集中精力搞整黨試點，要求不進行或暫緩進行。（迄一九八二年底止，中央一級應離休幹部還有百分之十九不肯離休，尤其高級幹部，還有百分之三十六。）③乘機私分財物。各地已有發生乘機構改革機會，突擊化錢與私分公家財物情事。④派性觀念作祟論資排輩，講派系，分親疏，甚至培植私人勢力，搞新的小山頭，互相傾軋爭奪。⑤新老幹部不洽。老幹部輕視年輕新幹部，不願進行「傳、幫、帶」，相互關係不洽。⑥歧視知識分子。歧視知識分子偏見仍深，因此流傳「我們打天下，知識分子坐天下」的說法。⑦改革實效未顯。有些部門，機構調整以後，一般幹部的思想觀念、工作作風並未改變，官僚習氣依舊，辦事效率未見顯著提高，使改革未見實效。

結語——中共的機構改革，它的性質只是中共在統治危機中調整它的統治機器，而不是從根本上改革它的制度，走向真正民主；只是爲了回復和增強它的統治效率，繼續奴役人民，而不是給予人民以真正的自由。所以不值得人們去寄以期望。

中共機構改革的主觀目標，原是要克服官僚主義，提高工作效率，適應「四化」建設，但能否達成，其關鍵在於新老幹部矛盾能否解決？老幹部是否願意放棄終身制和特權觀念？能否克服輕視知識，歧視知識分子的偏見？知識分子能否真正有職有權，而不是一種虛位點綴？以及黨風的能否根本好轉？而根本上，還在於中共能否放棄「四個堅持」的老框框。

（三）陳定中先生：中共經濟體制的改革

一九八三年中共強調是「改革」年，年初「人民日報」元旦社論就提出：「改革要堅決，經濟要抓緊」，作爲它全年的行動口號。說明今後在經濟領域中繼續擴大體制改革，將是中共經濟求變中的重要一環。中共爲什麼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據它說是因爲過去三十多年所建立的俄式經濟管理體制，缺乏效率，發揮不出經濟效益。在這套經營管理制度之下，企業賺錢得不到好處，虧本了有國家撥款補貼，即所謂「幹好幹壞一個樣」，中共稱它爲「大鍋飯」。尤其是中共的勞動工資制度不合理，「幹多幹少一個樣」，幹與不幹無所謂，中共稱它爲「鐵飯碗」。三十多年來「大鍋飯」的積弊，使得百分之三十以上的企業長期虧損賠錢，「鐵飯碗」養活着成千上萬磨洋工的懶漢，造成無形的人力物力大浪費。所以中共強調，改革經濟體制的目的，就是要「提高經濟效益」，要打破「大鍋飯」、「鐵飯碗」的舊框框，強調改革的重點就是要突出一個「包」字，要把「責、權、利三者統一起來」，使其符合人類利己、自愛的傾向。也就是從「政治掛帥」的極端走向另一個「物質刺激」的極端。

中共的經濟體制改革，牽涉到它的意識形態、經濟制度、運作體系、價格政策等多種層面，問題相當複雜。所以一開始內部就出現左、右兩種不同的意見。

右的一派主張吸取西方國家經濟管理的長處，實行大幅度的全面改革。今年一月二十日胡耀邦在「全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提出：「改革——也就是破舊創新」，呼籲支持鄧小平所謂「沒有改革就不可能有四個現代化」的論點。二月一日出版的

「紅旗」雜誌編輯部文章則提出：改革「是一場深刻的革命」，二月二日「人民日報」社論「做改革的促進派」更具體地指出，過去受了外國模式的影響，幾十年來事實證明這種模式是「不成功的有害的模式」。這裏所指的「外國模式」，就是蘇聯模式，也就是史達林模式，即蘇俄的社會主義制度。顯示胡耀邦所指的「創新」就是主張吸收西方國家的長處的全面改革，所謂「破舊」就是要揚棄蘇俄的「有害模式」，也就是「革命」性的全盤廢棄。

左的一派現在仍懷念着五十年代中期的「黃金時代」，認為蘇聯經濟模式儘管有缺點，但只要作局部調整，問題就可克服，毋須像鄧派那樣大幅度地接受資本主義式的市場經濟。現在中共內部重提五十年代「全國一盤棋」的口號。去年十二月陳雲提出的所謂「鳥籠經濟」，強調「搞活經濟，市場調節這些只能在計劃許可的範圍以內發揮作用，不能離開計劃的指導。」就是不主張進行全面改革的反映。

中共從一九七九年宣佈轉入「經濟調整」以來，因為內部對「改革」的取向，意見不一，理論上不能自圓其說，也缺乏具體可行的改革方案，以致令出多門，說法自相矛盾，改革的工作也遭遇到普遍的抵制。例如一九七九年宣佈「經濟調整」之初，中共強調「調整、改革、整頓、提高」並進，不久就改爲以「調整」、「整頓」爲主，「改革」爲輔。一九八二年十二月趙紫陽在「五屆人大五次會議」又宣稱：「體制改革，頭緒紛繁」，全面改革的條件尚未成熟，「第六個五年計劃」之內，還只能是研究制訂改革方案。等於說這些年來所進行的只是一些小改小革，全面性的改革，要留待下一個五年計劃才能進行。目前中共在經濟系統所進行的一些小改小革是：

(1) 農業方面，主要是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其中絕大多數是包乾到戶或包產到戶，並允許農民離開農業耕作，成爲專業戶、重點戶，以及允許農民結合成各種經濟聯合組織。總的方向就是由原來的集體生產，集中控制，改變爲個體的分散的耕作，人民公社也在進行「政社分設」的試點工作。

(2) 工業方面，主要是推行上繳利潤包乾，和包生產等責任制，把小型的國營工業包給職工集體管理，或包給個人經營。最近又在推行以徵稅代替上繳利潤的「稅代利」辦法。

(3) 商業方面，主要是把國營商業的門市部、飲食店、服務業等，分給職工集體營業，或包給個人管理，自負盈虧。允許農民從事農產品販運，價格方面則允許一些小商品，可以不限制統一價格出售。

(4) 交通運輸方面，允許地方自建港口、碼頭、泊位，誰建誰管誰受益，允許私人購買拖拉機、機動船和汽車，經營運輸業。中共雖然強調經濟體制改革是要打破原來的「大鍋飯」和「鐵飯碗」等舊框框，但是目前所推行的一些改革措施，却仍然訂

下許多新的框框。例如今年二月中共發佈的「城鄉集市貿易管理辦法」，規定繼續由國營商業控制商品供應和物價。三月中共「國家經委」提出的工業管理體制改革五條原則，規定改革要在堅持計劃經濟爲主之下，把「大的管住管好」，小的才讓「搞活放

寬」。中共交通運輸體制改革中允許私人購買拖拉機、機動船和汽車經營運輸業，而又避開所有制的問題。均反映中共的體制改革是在避開觸及「四個堅持」的大框框而立下新框框之下進行的。由於中共「四個堅持」和馬列經濟理論不能變動，所以許多改革措施一碰到制度問題就無法突破，新的問題越來越多。同時由於「四個堅持」不變，許多幹部便認為「改革」只是權宜之計，因而對改革採取觀望態度，或在執行上「留一手」，以為未來的政策反復留下退路，使得經濟體制改革的問題，更加分歧複雜。現在已經顯露出來的問題是：

(1) 經濟改革損害到中下層幹部的既得利益，在鄧派所謂「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和起用「明白人」的改革下，許多幹部必須交權讓位，尤其是幹部從終身制改為「合同制」，非但連原來的職位和今後的生活都得不到保障，而且由所謂「工人當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又回到了僱工地位。所以，大陸的中下層幹部和職工，為了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便採取各種方法，抗拒經濟改革。像農村的包產措施，就被指為方向錯誤，說它姓「社」姓「資」身份不明，成份可疑。包產所帶來的刺激增產作用，雖有助於經濟復甦，但農民怕變的心理，引發亂砍林木的風潮和各種經濟犯罪活動，也造成嚴重的社會混亂。

(2) 中共現在在農村所進行的「政社分設」試點工作，進展緩慢，原因是政社分開後，分出來的經濟組織，如何設置機構和經營管理，迄今未有定案，中共只說由各地羣衆民主決定。主要原因是農村建鄉後，生產大隊改為「行政村」，大隊一級已喪失經濟的職能，而生產隊實行包乾到戶之後，只剩下一名隊長和一名會計負責簽訂合同和收租，也不成爲一個經濟組織。所以，政社分開後，大隊和生產隊兩級經濟組織無形趨於瓦解。未來如何解決，現在中共尚無有效對策。

(3) 中共所推行的承包經營和生產責任制，係以賺錢作爲目標，因爲賺錢與否是衡量承包者完成任務的標尺，所以追求利潤的傾向，現在已經處處和中共的計劃管制發生嚴重衝突。

(4) 承包者逐漸取得經營管理權和相當數量的財權之後，正在形成一個經理階層的特權階級。這一部份人以腦筋靈活、長袖善舞的黨員和幹部佔大多數，與那些被裁汰下的幹部，形成強烈對比，正在造成中共幹部隊伍內部的嚴重分化。

(5) 在中共計劃管制之下，原材料和商品價格仍然受到統制，承包者爲了取得原材料和打開商品銷路，已經助長了搶購、套購、走私、走後門、送禮賄賂等經濟投機活動，中共防不勝防，窮於應付。

(6) 承包合同一般只有幾年的期限，爲了完成任務和多賺錢，必然助長掠奪性經營傾向。在工廠是不愛護機器設備，造成使用壽命縮短，折舊增大；在礦區是亂挖礦苗，破壞自然資源；在農村是只種地不養地，使土地資源惡化。

(7) 承包經營還會帶來重複生產，惡性競爭，以小吃大，苦樂不均，技術封鎖，地區封鎖等混亂現象。

中共現在進行以「包」字爲中心的改革，實際上就是恢復私有的個體生產，但中共又不甘放棄「社會主義公有制」，更不敢拿下共產主義的招牌。現在事實證明，承包責任制在一個部門之內，雖然有助於提高經濟效益，但在「公有制」之下，却不可避

免地要帶給整體經濟更多的浪費和更大的混亂。現在中共把「包」字美化為所謂「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一個發展階段」，雖然是自欺欺人之談。但也有可以注視的地方。

第一、中共為什麼說改革「是一場深刻的革命」，是不是表示中共有一天終將放棄走不通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

第二、在「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遮蓋下，中共會不會採用抽象肯定，具體否定的方式，讓更多的個體經濟和分散經營存在，最後造成從量變到質變的既成事實，使統制經濟制度銷於無形？

（四）玄默先生：中共文教科研體制的改革

文化方面 目前只有少數文藝團體試行管理體制的改革。趙燕俠領導的「北京劇院」一團試行經濟「大包乾」：集體經營演出業務，「國家」由一包到底改為定額補貼，全隊人員暫領百分之七十工資，演出收入補足所餘百分之三十以後，再按貢獻分紅。「廣州魔術團」實行每月收入超過標準按比例上繳「國家」，不足標準不繳，不及最低標準由「國家」發工資；個人分配多勞多得。其它單位的改革與此兩種大同小異。

舞臺美工、舞臺設計和樂隊的專業化、社會化，即成為獨立單位，與各劇團訂立合同。此一構想尚未試行。大陸文藝作家除巴金一人外，均領工資。現在有人主張作家不領工資，靠稿費過活，有人主張減薪一半，其餘實行浮動工資。目前僅有「作家協會」浙江分會着手進行「專業作家管理體制改革」試驗：經本人申請，「作協」分會批准的專業創作員，辭去原職，三年內由「作協」分會發給略高於本人工資的生活補助費，三年後靠稿費為生；設立基金解決他們的醫療福利問題；創作出差費用由組織活動單位或「作協」報銷；創作員因故不能創作，應自行另謀職業。

文化領域其它部門的改革，勢在必行，以克服長期存在的機構臃腫、人浮於事、收入微薄、經費困難、忙閒不均、苦樂不勻、個人創造性和積極性不能發揮的弊端。但在黨的絕對領導權上，在文化工作必須負起黨所規定的思想政治教育任務並產生符合黨要求的社會效果上，中共却要墨守舊制，不許改革；因此，改革之不徹底、不全面與扞格難行，實可預斷。

教育方面 「中國科技大學」化學系副教授溫元凱提出的「教研室體制改革」方案，兼具領導體制與管理體制的改革意義，其具體辦法如下：①實行集中領導，教研室主任兼黨支部書記，設一副主任；②實行聘用制，公開招聘缺員，逐步做到人事可以流動；③教研室主任有人事（任用與裁員）、工作、財政三位一體的權力，有權籌集教研室基金，有權運用和扣除獎金、工資以及給予獎金、補貼等財政獎懲手段；④教研室通過辦短訓班、向社會尤其是產業部門提供諮詢、解決技術問題和其他問題，以獲得財政支持；⑤鼓勵教職員工在完成定額工作量前提下，到社會上尤其是產業部門去兼職兼課，當技術顧問，獲得額外報酬，教研室對額外收入留成；⑥實行定期民意測驗，考核教職員工的教學和工作質量；⑦逐步形成有特色又適應目前教學體制的科研方向，面向「國家」和產業部門的重大課題。

教育的體制改革主要是大學教育，而溫元凱的教研室改革方案適用於高等學校，現在已經得到中共中央、各高等學校和教授學者的肯定，正在繼續試行和推廣中。其中第一條「集中領導」即黨政合一，僅實行於教研室，「中國科技大學」的黨委和校長仍然分開。貴州省推薦溫元凱方案，黨政就沒有合一，而是實行「教研室主任負責制，黨支部起保證監督作用」。黨政不合一，職權界限即無法明確劃分，以黨干政、以黨代政將難以有效避免。

自然科學方面 「中國科學院」科研及管理體制的改革措施：①重用優秀中年科技人員，吸收一批進入領導崗位；②對確有成績和貢獻的中青年科技人員，給予破格晉升或浮動津貼；③允許科研人員在完成本職任務前提下，兼職兼課並取得合理酬勞；④從事成果推廣、技術諮詢、技術服務的人員，可從收入中按一定比例給予獎勵；⑤攸關項目、課題組負責人，有權招聘、解聘所需人員；⑥實行特殊優惠政策，鼓勵科研人員到邊遠地區研究所工作；⑦試行研究課題承包責任制，及大型儀器設備承包管理責任制；⑧試行招聘合同制，逐步改革人事制度；⑨改革獎勵制度，凡工作收益大的可給大獎，周期長的可分階段給獎，從事基礎研究的按成果或意義大小給獎，從事管理、後勤成績突出的設專項獎金。

社會科學方面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及體制改革：①實行科研項目的合同制或協議制，院、所兩級的重點科研項目試行承包，個人對室、室對所、所對院訂出合同或協議，每所可選一室試行全面承包；②建立優秀科研成果評獎制度，今年開始總評，以後每年一次；③鼓勵人才流動，院內根據科研人員志願和接收單位要求進行，院外鼓勵地方科研單位流動；④科研人員完成規定任務後，允許到外單位兼職，或幫助地方建立研究所、室，並收取合理報酬；⑤試行承包制時，也可根據具體條件試行浮動工資，各所可試辦各類諮詢機構，並收取費用。

評估 中共進行文教科研體制的改革，目的在於克服「鐵飯碗」、「大鍋飯」的積弊；但因「鐵飯碗」、「大鍋飯」為社會主義的典型制度，加上思想政治專政不在改革之列，所以這種改革在某些部門可能有程度不同的效果，却不可能做到中共所謂的全面而徹底的「破舊創新」，社會主義的基本病態將繼續存在。堅持改革的鄧胡派想通過體制改革，把文教科技的領導權，從外行的政治官僚轉移到內行的技術官僚手裏。此一目標現在已在逐步實現中。不過由於他們也要利用改革去排除異己，以致改革的過程同時也是權力鬭爭的過程，必然要遭遇複雜多變的干擾和阻力。

中共目前正在進行的改革，與一九七九年開始的「調整、改革、整頓、提高」八字方針的改革不同。八字方針的改革是改良主義的改革，目前的改革是革命性的改革，「紅旗」雜誌就說「是一場深刻的革命」。這場革命性改革的重要目的，可以說在於改變老粗當權、文盲治國的局面，使各級各部門各單位的領導職務都有一部分由知識分子擔任。這是中共從推行「八字方針」的失敗所得到的教訓，深知不是知識分子在位，「八字方針」根本無從做起，所以，中共不但要依靠知識分子實現「四個現代化」，就是這場革命性改革能否成功，也是決定於知識分子能否當權。目前的情況，據錢偉長說：「老一輩豁出去了，因為估計十年

之內不會變，青年知識分子則還在懷疑」。中共自己也指出，一般知識分子認為中共「遭遇困難講政策，形勢好了變政策」。——這就是所謂信任危機，說明了中共一貫言而無信的作風，已使知識分子再也不敢信任它。所以，怎樣使知識份子政策落實，是當前中共進行全面改革必須解決的問題。

(五) 蕭真美女士：中共的農業聯產承包責任制

目前我正在研究有關中共農業問題，重點是「中共農業新發展——論聯產承包制與大包乾」。我的發言就是從這裏摘出來的。由於中共的農業生產責任制推行至今，已經形成極為複雜的局面，不是三言兩語可以交待清楚，現在我把它分為五段加以說明：

- ① 人民公社的瓦解。
- ② 生產責任制的種類與內容。
- ③ 生產責任制的成效。
- ④ 現階段的發展與問題。
- ⑤ 結論。

第一、人民公社的瓦解。

談中共的農業發展，先得知道他們心目中的「農業」是什麼？十九世紀歐美的「語意學派」認為，談論一個問題，先要把名詞定義弄清楚。「農業」照他們的著名的科學家錢學森的定義是說：「利用太陽光的能量，通過生物的轉化，生產人類需要的東西，即人類需要的食物、工業原料和生產能源；又通過生物本身的存在，如森林、草地、改造自然，創造一個人類和生物本身所需要的理想的環境。」按照這個定義，農業的範圍極廣，包括種植業、林業、牧業、禽業、漁業、蟲業、微生物業、副業等等，只要與農村有關係的行業都包括在內。而要搞好農業，就要「天時、地利、人和」三者配合才行。天時和地利，大家都能明瞭。至於人和，就是決策者所採的農業政策及規劃經營的管理方法。這是人可以控制的，也是決定農業能否發展的重要因素，我們便是針對這一點來討論的。

有關人民公社的歷史我就不說了，但是它的組織還是大略介紹一下，因為和後面幾段討論有關。毛澤東是在他的「生產關係決定論」下創設人民公社。其組織如下：約卅五戶農家編為一個生產隊，擁有耕地（土地當然是公有的）、牲畜、小型農具、池塘、托兒所等。然後是六至八個生產隊編為一個生產大隊，擁有中型農具、搬運工具、中型的水利設施、小型工場、小型學校等。最後再十個左右的生產大隊編成一個人民公社，擁有拖拉機、公社工場，比如農機具修理工場、農產物加工工場、大型水利設施等等。各位想想，在範圍這麼大的情況下，一個人民公社少說也有一萬人左右，管理是不是很難？光說分配，也就是年終發薪水時，生產資料和土地都是公家的，最後的收成是用「工分」計算的，這種計算完全沒有一個定準。人民公社的收入分配是這樣的：百分之五是農業稅，百分之一至三是公共福利金，百分之十是公積金，百分之三十是生產費及管理費。這些公家的費用就幾乎佔掉一半了。其餘再按「工分」分配給社員。但是「工分」沒有固定的值，必須等到全年收穫完畢，在全部的收益中，扣掉公家的，其餘剩下的才能確定「工分值」，然後由幹部評工，看你該得多少工分，再向生產隊去支領口糧及其他報酬。如果年景歉收，幹部貪污，以及一些公家的設施用掉的錢太多，那分給農民的也就所剩無幾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才會產生五九、六〇、六

一年的三年大饑荒。那時，劉少奇趕忙出來採取「三自一包」的救急措施。現在，毛澤東一死，鄧小平好像也顧不了那麼多了。人民公社的組織實在無法配合農業的經營管理，這兩年正醞釀取消，我們從資料中可以得知，人民公社現在只是個空架子，許多地方連生產隊都瓦解了，採取戶與戶聯合成村、鄉的型態。

第二、農業生產責任制的種類與內容。

對於生產責任制，大家最耳熟能詳的，便是「雙包」（「包產到戶」和「包乾到戶」）。事實上，大陸幅員這麼廣，生產條件相差太多，採取的責任制也依照各地方的情況而異。總括來說，大概分下面兩大類：

一類是不連繫產量的生產責任制，也叫包工制。就是生產隊把農活作業包給按勞力或者是按戶組成的作業組，只對作業的質量負責，超產獎勵，減產懲罰。如「小段包工、定額計酬」。

另一類是連繫產量的生產責任制，也叫包產制。特點是承擔一定生產項目的作業組或個人，要對生產的產量負責。這個還可以分為下列許多種：1.專業承包，聯產計酬。2.綜合承包，聯產到組（也叫包產到組）。3.統一經營，聯產到勞。4.包產到戶。這些名詞，大家可以從字面上大略想像它的內容。但是事實上每一種都依地方、區域、生產隊自己，而有不一樣的作法和內容。在這裏，沒有辦法仔細介紹。可以簡單的這樣說：生產隊和作業隊、作業組或作業戶、作業工簽定合同來作業，超獎減賠，但生產的最後產品的核算還是交給生產隊。最後一項「包產到戶」，却是以社員戶為單位，向生產隊承包一定的生產項目，並對其產量負責。又分為幾種不同的作法：1.專項包產到戶。2.部分作物包產到戶。3.全部作物包產到戶。4.包乾到戶。這個「包乾到戶」是包產到戶的一種特殊型式，現在却常拿來和「包產到戶」並列。其實「包乾到戶」和其他作法，最重要的差別在於「包產內的產品不是交生產隊統一分配，而是由社員戶交完公家的徵稅後，其餘的產品全部歸社員戶自由支配。就是因為這樣，除了土地外，幾乎可以說與自由經濟的農民相差無幾了。所以現在大陸各地的農民都歡迎這種型態的責任制。他們有一句話說：「大包乾，大包乾，直來直去不拐彎」，就是指社員可以直接處理產品。總而言之，第二類連繫產量的生產責任制不管是什麼形態的，因負責作業的單位，最後都要對產量負責，所以一般都以「聯產承包責任制」這個名詞來代替所有的責任制。又因「包乾到戶」的產品可由社員自由支配，所以最受農民的歡迎，也常常出現在他們的報章上。

第三、生產責任制的成效。

據說，全大陸現在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生產隊，已佔生產隊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二。其中，家庭式的聯產承包制（也就是「包乾到戶」）又佔百分之七十八點七。據他們說成效不錯。以安徽鳳陽縣為例，那個縣以前都說是「十年倒有九年荒」的，現在實行大包乾後就不同了：①生產有較大的發展。一九七九年，全縣六十四萬畝小麥，總產一億七千九百六十萬斤，比歷史最高水平增長近五成。②貢獻大，積累多，公積金、公益金都增加不少。③社員收入增加、生活改善了。④簡便易行，適合當前農民和

幹部的管理水平，帳目簡單好算。⑤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緊密連繫。因為大包乾就是「保證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的就是自己的」。所以社員對種多少，收多少，上交多少，自己能分多少，都很清楚，因此就能積極參與農事。

第四、現階段的發展與問題。

責任制雖然有正面的作用，但也連帶的帶來了許多後遺症，使中共的農村面貌也改變了。

①出現了許多所謂的專業戶、重點戶。因為生產責任制是由生產隊與作業組或作業戶簽合同，所以有專長的人就組合起來，形成這種新風貌。這些專業戶不事種植，而是從事一些如飼料、養殖等其他的專技行業。

②新的經濟聯合體。如福建的鄉村，有幾戶或十幾戶投工投資聯營的磚瓦窯、水產養殖場、修船廠等。這就打破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旗號了。

③承包合同的問題。生產隊與作業戶簽定承包合同，各地的做法不一，必須經過許多層很麻煩的手續。有時候執行得不好，還會起爭執。聽說還發生過幹部看專業戶賺了錢眼紅，把合同撕毀的。

④幹部問題。以前人民公社規模大，分配核算管理都要許多幹部，現在人民公社瓦解了，各戶自己組合，那些沒有其他農技之長的幹部就失業了，因此引起反對的風潮。

⑤分配問題。以前採取工分制。現在由於專業戶和新的經濟聯合體的出現，也同時出現了收益分成制度及股金分紅制，都已類似自由經濟的股份公司和商號了。這是用共產主義理論解釋不通的。

⑥土地問題。許多農民在承包的土地上蓋房子、做窯、燒磚，甚至出租轉讓，形同私有的土地。

第五、結論。

人的生存問題，基本上在於求溫飽。大陸十億多人口，百分之八十是農民，溫飽問題如果不能解決，便是動亂的根源，歷史上發生過不少次農民揭竿起義的事，便是明證。實行大包乾後農民的收入是增加了，生活是改善了，但上述的後遺問題是原來僵化的人民公社體制所留下來的，他們還得想辦法慢慢解決，這也是要費一番力氣的。生產資料和土地公有是共產主義的原則，但從報紙和許多資料上看來，他們所謂的生產資料，如生產工具和牲畜，有些已經陸陸續續的轉成私有了。照這樣下去，將來土地問題恐怕也漸漸會由公到私。而專業戶、新經濟聯合體的出現，表示商業網也出現了。本來依照馬克思的理論，共產社會是不需要商業這一環的。這樣子，時間一久，中共經濟便會開始由量變到質變，變為他們原先所恐懼的資本主義經濟了。儘管他們如何利用馬克思的詞語強加掩蓋，也不能消滅存在的事實。

八、自由發言：

趙先運先生：爲什麼要改革？

討論中共體制改革問題，首先應探索它爲什麼要改？即改革的動力爲何？個人認爲中共進行這場改革，絕不是它主動想要這樣做，而是由於大陸客觀情勢的壓迫和中共幫派鬭爭主觀的需要。

就大陸客觀情勢說，大陸同胞經歷毛澤東二十七年暴政統治的浩劫，久懷變天思想。到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死亡，這種窮則思變，變則要革命的民情，乃爆發，中共自知逆此潮流，便將被沖刷滅頂——這從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門抗暴事件和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北平天安門廣場的大字風潮，可以明白的看出；所以，它便不得不採取「社會主義改良主義」的措施，以期麻醉人民革命的情緒。

就中共幫派鬭爭的主觀需要說：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鬭爭「劉少奇、鄧小平反革命司令部」，所批判劉、鄧的罪狀，在理論方面，如階級鬭爭熄滅論、黨內和平論、剝削有功論、入黨做官論、唯生產力論；在經濟措施方面，如所謂「三自一包」，即自負盈虧、自由市場、自留地和包產到戶；在對外政策方面，如所謂「三和一少」，即對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反動派要「和」，對各國人民革命的支援要「少」等；都經中共第九次黨代會定爲劉、鄧破壞「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罪狀。鄧小平今既翻案當權，當然要另搞一套是非，於是乃舉起「撥亂反正」的大旗，把前此被毛江批倒批臭的東西，洗刷改裝，再搬上場，成爲今日體制改革的主要措施。

其次，我們要探索所謂的體制改革，要往何處去？鄧小平說他要建設「中國式社會主義」，其內涵包括「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兩大部份。「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以共產主義爲核心」，它保證「物質文明建設」的方向。「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則是「精神文明」的基礎。但如更進一步追問它，具體的組織形式，則鄧、胡、趙等至今也不知道。在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週年（三月十三日）紀念活動中，胡耀邦發表長篇講話，周揚、于光遠等發表長篇論文，同聲說，按照科學共產主義奠基人馬克思的教導，在俄國固然沒有實行共產主義革命的條件，在中國更加沒有實行共產主義革命的條件，只是由於列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才在俄國「幹成了十月革命」，也只是由於毛澤東又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才「在中國革命成功」。至於「革命」成功以後，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社會主義制度應該採取什麼樣的形式，胡、周、于等更同聲說，馬克思沒有教導，他們現在還不知道，當務之急是「發展作爲社會主義建設的科學的馬克思主義」，「作爲社會主義革命的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了；「作爲社會主義建設的科學的馬克思主義」還沒有「發展」成功；所以，當前中共乃陷於歧途徬徨的盲人瞎馬的困境。

再次，我們探索中共當前進行的所謂「全面改革」，雖有五花八門的措施，但總括起來說，不外一個「鳥籠模式」，即以經濟體制改革爲核心，並把經濟看作小鳥，雖然不能再像毛澤東時期那樣把它緊抓在手中弄死掉，但也不能像自由世界那樣放任把它弄飛了，而必須把它放在鳥籠裏。這鳥籠，在政治方面，便是堅持中共黨的領導；在經濟方面，便是堅持社會主義計劃經濟。

另一個是「魚網模式」，實行各種形式的承包責任制，透過承包合同，把責任加給工、農、兵、學、商、黨之幹部。每一張合同都是一個網結；一張大網籠罩著十億人口；而堅持黨的領導便是緊抓這網網。這種「合同治國」的怪招，或可說是中共統治的現代化。

最後，我們回顧毛澤東死亡六年來，中共先叫「四個現代化建設」，繼之於一九七九年初提出「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八字方針」，用作「四化」的第一戰役，即為「四化」準備條件。既言準備條件，則「四化」本身便已擱置。而今為進行體制改革，又推動機構改革和「幹部四化」，即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為進行「幹部四化」，又推動新老交替和整黨。歸根到底，落實到要清除「三種人」：跟林彪「四人幫」造反起家的、幫派思想嚴重的、打砸搶份子；和另外兩種人：反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路線政策的，在經濟領域和其他一切領域嚴重犯罪的；總之，即一切反鄧份子。體制改革歸結於鄧派整肅異己，這才是真正的重點所在。

我們再回顧中共推行體制改革的歷程，可以看到它最初只是改良主義策略的運用，但因易放難收，現已陷入騎虎難下的被動地位。大陸社會私有意識氾濫高漲，個體經濟和城鎮集體經濟，像螞蟻啃骨頭一樣，蝕食著中共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中共如其其嚙食，則可能將被龐大的螞蟻雄兵撕扯到筋骨無存，若採取揮打驅逐措施，則又將是政策反覆，而鄧、胡、趙則自然又要戴上「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帽子，如何解決此一兩難問題，乃是中共當前潛在的重大危機。

陳濟民先生：最主要背景——被迫應困境

我們可以肯定，中共今天的全面改革，是被迫應難局全力維護統治的行為，是在荊棘叢中尋找出路。造成它今天在思想上與行為上的困境，淵源於下列兩點：1. 長期反蘇共，使其在基本思想信念上動搖；2. 由於大陸鐵幕戰後與中華民國政治成就不成比例，令其在政治體制上破產。這兩者都是致命傷。目前中共的改革，只是在想盡辦法，由這兩方面來進行其挽救工作，即在思想上，以如何爭取知識分子向心為中心，在行為上，以如何促進農村生產意願為中心。它的機構改革、人事調整、解放思想，以及工農方面的改革措施，都是環繞這些環節所作的努力。

中共面臨的問題，與其他共黨政權不相同，與俄共更不一樣，希望用改革方式達到延長共黨統治的意圖，很難收到決定性效果。主要原因，除了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背景與其他共黨政權先天下有別外，就是年老一代中共黨員與幹部思想的變質。換言之就是馬列主義理想與體制已喪失了令人獻身的說服力，而中華民國與西方反奴役政策方向與成就又明顯的成為大陸追求的信念目標。這兩者決定了中共改革的命運，使它在進程中建立不成一致的信心，更阻止不了由思想上形成的自發的反奴役，爭自由的潮流、知識分子政策不能落實、經濟措施搖擺不定，都是出於此一因素。

總的來說，中共今天的各項改革措施，都是敷衍表面的治標行為，是權力壓抑下的形象，不是在一致信念下自然的發展，一

巨權力改變或派系鬭爭易勢，則又是一場反覆的局面。此種變化，不是偽政權走向鞏固而是反奴役的思想與力量逐步高漲。

王章陵先生：中共全面改革的政策取向

綜觀中共實施全面改革，其基本政策的取向，有四個重點：

第一、是黨的領導與所謂社會主義民主相結合。從其所謂社會主義民主來看，除舉辦基層選舉外，最近還有所謂「民主推薦領導班子」。如在湖南，省委領導幹部由縣級領導幹部一、五〇〇人集會討論，列具四五〇人作為推薦名單，以備黨的領導選擇委派。這是一種新的型式。

第二、是統一經營與分散經營相結合。所謂統一經營，就是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按勞分配，有計劃地發展經濟；所謂分散經營，就是實施各種形式的聯產承包責任制。譬如在農村，土地公有，社隊保留必要的統一經營的職能，但分散經營，有土地經營專業化，專業組和機械服務承包聯合，而中共特別強調家庭式經營的存在，說這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形式。

第三、是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在商業方面，中共也強調堅持統一的社會主義市場；堅持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原則。也就是說，國營商業仍居於主導地位。

第四、是政治思想掛帥與文學藝術形式多樣化相結合。在文學藝術方面，中共允許題材、創作方法的多樣化，不片面強調文學的階級性，承認文學的共性，但是，基本的原則，仍然是政治掛帥。

從以上政策取向觀察，可作三點評估：

第一、它的政策具有矛盾性。由於財產制度的不同，產生兩種政治模型：一為民主國家；一為共產國家。在民主國家，它以私有財產為基礎，因財產私有，產品的交換必須通過自由市場，因自由市場的運作，出現自由經濟；因經濟自由而有政治自由，是謂民主政治。在共產國家，它以共有財產制為基礎，因財產共有，產品的分配與交換不仰賴自由市場，而係依靠政治權力。以政治權力調節經濟行為，是謂計劃經濟。由於經濟權力的集中而有政治權力的集中，這就出現極權的「無產階級專政」。因此，兩種政治模型，涇渭分明，是不可以混淆的。可是，今天中共的改革，一方面保存其共產制度的特徵——四個「堅持」；一方面却給予人民有限的經濟自由，很明顯的，這就是它的政策的矛盾性。

第二、政策的矛盾性，必然產生政策的變動性。當前中共的政策，並不是什麼新奇的東西。在中共黨內，早已有兩種不同的爭論。他們討論，共產黨奪取政權以後，究竟要怎樣進行社會改革，才能進入共產主義社會？關於這個問題：一種意見是說，必須先機械化。也就是通過資本主義走向共產主義；一種意見是說，必須先集體化。也就是通過集體主義走向共產主義。

這兩種意見作為中共的政策，已有三度的交替變化。當一九五〇年土改初期採取第一種意見，發展富農經濟，可是執行土改

法，却完全變了，改行第二條路線，由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到實行人民公社，這是顛峯時期；人民公社失敗，劉少奇起而調整政策，走的是第一條路線，可是，到「文化大革命」，又回復到第二條路線；「四人幫」垮臺，又回復到第一條路線。當今的政策，只可以說，它是劉少奇路線的復活，並且又有了一些新的發展。這一條路線，是從考茨基、布哈林等人的思想發展而來的，共產黨人把它叫做「唯生產力論」。

從歷史來看，中共的政策路線，過去由於受到黨內衝擊，已有三度變化。我認為，在今後，它也很難穩定。因為，它政策的本身具有矛盾性。拿共產黨的話說，矛盾必然產生鬭爭，產生量變與質變。到質的突變，就是揚棄舊質的「革命」了。而我則認為，根本的問題，是在財產制度。假定中共要保存共產制度，就要政治獨裁，就不能給人民以自由民主，更不能讓人民發展自私自利心；假定要给人民以自由民主，讓人民發展自利心，就必須取消「四個堅持」，實行私有財產制。兩者不可得兼。今天中共的改革，好像是要利用人的自利心，培植一顆人的小花，可是在小花的上面，却壓着一塊大石頭，不讓它繁榮茂盛。這樣，它的結果，不是壓死小花，就是小花以小吃大，衝破大石頭，開創一個新的局面。這不是神話。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早就說過，人的自利心，是一隻具有神力的冥冥不見的手。任何政治不能處理好這一隻手，最後的命運只有覆亡。這一個問題，可以說，就是中共全面改革基本關鍵之所在。

張念鎮先生：馬克斯理論的動搖

去年九月鄧小平在共黨「十二大」強調要在廿年內抓緊「四大工作」，其中頭一件工作就是進行機構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所以當前中共實施的改革主要就是包括這兩個方面：一是機構改革，二是經濟體制改革。

所謂機構改革，主要是精簡機構、裁減冗員、消除長期來的機構臃腫、領導班子老化，以及官僚主義的弊端，廢除幹部終身制，以期實現幹部政策的「四化」，這就是屬於政治方面的改革。

目前在匪黨中央及偽國務院的機構改革已經大體完成，惟有省級以下的地方機構的改革仍在進行之中，在大陸廿九個省、市、區之中，現有廿五個省、市、區完成了初步的機構改革，但在這廿五個省、市、區中只有四川、廣東是召開黨代表大會式省委全體會議實施改革，其餘均係採取內部協商後由匪黨直接派任。在已改革的廿五個省、市、區當中，仍有湖南的毛致用、廣西的喬曉光、雲南的安平生、遼寧的郭峰等十多個省、市、區的第一書記均未更換。隨着地方機構的改革，凡是陳雲所說的「五種人」以及年齡老化、思想蛻化、作風腐化，乃至缺乏專業知識的幹部，均將淘汰，特別是「文革」時期和華國鋒當權時入黨的二十萬黨員都將在機構改革中慘遭整肅，故鄧匪所謂的機構改革，實質上就是他權力鬭爭，剷除異己的一個代名詞而已。

至於經濟體制的改革乃就牽涉更廣，包括了產業結構、企業管理、經濟計劃、價格體系、稅收制度、工資制度等改革，以及匪偽政權與企業、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城市與鄉村、生產與流通等各種關係的改革，不僅將影響到共匪的農、工、商與其

他各業，甚至對於匪偽文教、科技、與社會生活均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共匪的經濟體制改革，最先是從農村中實施所謂「聯產承包責任制」而開始的，這種制度也叫做「生產責任制」，它是以「包」字為核心，通過包產到戶、包乾到戶、技術承包、經營承包、和開發性的基建承包等五種不同的形式，所採的農民小私有制與共黨所謂全民所有制相互結合的一種公私兩利的混合制，既無損於共匪的應得利益，又能刺激農民的生產意願，搞活農村經濟。因此，共匪刻正設法將這種制度從農業移植到商、工、交通甚至文教、科技和衛生等各方面，以期改變當前大陸貧窮落後的面貌，建立有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但是由於「聯產承包責任制」是與馬列主義的經濟理論相違背，祇要共匪不放棄馬列主義經濟上的教條，不放棄鄧小平所提的「四個堅持」，共匪經濟體制改革不僅是難於成功，而且必將激起保守派的強烈反對。

例如今年元月匪黨中央所下的「中發字第十四號」文件准許農村包產到戶的農民，在勞動力不足，無法耕種的情況下，可以將農地出租他人而收取租金，重新恢復不勞而獲的所謂「剝削制度」；又如最近匪「人民日報」透露：石家莊市一些實行「經營承包」後的飲食店或副食店，不按承包合同經營，片面追求商業利潤，損害消費者利益，經匪調查其中缺斤短兩者佔百分之三六·三，商品規格不合者佔百分之三七·二，因而共匪自稱：「奸商又復活了」。

凡此情形不僅動搖了馬克斯「剩餘價值」的理論，也徹底否定了毛澤東人民公社的制度，加深匪偽內部的「信仰危機」。現在的中國大陸普遍都存在着「羣衆怕左，幹部怕右」的心態。卅多年來共匪的經濟始終都是屬於「死、急、放、亂、抓」的惡性循環之中，「一死就急，一急就放，一放就亂，一亂就抓，一抓就死」。這也正是習仲勳所說：「困難時定政策，形勢好時變政策，運動來了批政策」。當前共匪雖然採取了全面改革的政策，但却仍然無法收攬十億人民不滿共匪暴政的人心。

今天全世界的共黨國家都面臨着經濟的貧困，究其主因即在政治體制的不良，沒有真正的民主與法治，則任何的改革或修正，均將無補於共產極權制度的大殘大缺。所以當前共匪實施的全面改革，祇不過是大失敗前的最後掙扎而已。

李天民先生：三階段的發展

「十二大」鄧小平提出「實行『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應該是中共今後號召改革的方向。毛澤東死後，中共對現代化的提法，是先由「四個現代化」到「中國式的現代化」，再到現在的「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當然每個涵義多少是有不同的，這可能是最後一次的提法。

如果更廣義的看中共全面改革，從大方向去了解，中共必須要能建立一個與蘇俄的現代化不同、與英美的現代化也不同的現代化，這不是中共一舉手一投足就可以完成的。

中共對機構體制的改革，可能會有收獲，但是要達到上述方向，中共所具備的條件，是令人懷疑的。

汪學文先生：當前中共教育改革之構想與措施

三十餘年來，中共的教育改革不僅具有全面性，而且具有持續性，以致大陸各類各級學校始終不穩定，沒有建立一套完整可行的制度。

近年來，中共推行四個現代化，強調要以科技為關鍵，教育為基礎，因而又要改革教育。

中共教育，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曾出現許多怪現象，也遭受了極為嚴重的破壞。所以這次的教育改革，必須大力進行，普及與提高並重。

中共教育改革之基本構想

(一)方針與方向：1.根本方針——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仍具有階級性、政治性、勞動性。2.當前方向——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即堅持「文革」前十七年的方向；後者在「文革」時曾受批判，指為走修正主義道路。3.基本原則——當前中共要求各級學校深入進行「四項基本原則」的教育，並加強思想政治教育。然而大陸青年學生則認為：根本任務只是學習科學，與政治無關。

(二)普及與提高：1.提高：主要是興辦各級重點學校，中共教育部直接主辦二〇所中小學，九六所高等學校。但是由於師資、經費、和設備等均短缺不足，形成「重點不重」局面。2.普及：目前大陸小學基本狀況是：入學率九〇%、鞏固率六〇%、及格率三〇%，仍未普及。3.各種文化程度人口狀況的比較：(1)每十萬人中的大學畢業生：臺灣一、八四〇人，大陸四四人。(2)每十萬人中具有高中程度的：臺灣二九、二〇〇人，大陸六、六二二人。(3)臺灣十二歲以上未受教育者，幾乎近於零，而大陸却有文盲和半文盲二億三千五百餘萬人，佔總人口二三·五%。

(三)教學與科研：目前大陸重點高等學校要辦兩個中心：一為教學中心，一為科研中心，以致形成「重理輕文」的錯誤傾向，降低文化水準。

中共教育改革之各項措施

(一)高等學校：1.全日制與半工半讀制：實行所謂「兩條腿走路」的制度。2.學年制與學分制：目前正紛紛試行學分制。3.住校制與走讀制：大陸高等學校原採住校制，以便管理，近始招走讀生。4.學位制與學銜制：學銜制「文革」停頓，近始恢復，學位制三十年來未建立，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始施行「學位條例」。

(二)中等學校：1.三二制與三三制：大城市和重點學校，紛紛實行三三制。2.普通中學與重點中學：重點中學為升學搞「大突擊」，使學生陷於「題海」之中。3.高中與職中：一九八〇年大陸中等學校一一八、三七七所，職業中學僅三、三一四所，結構畸形。而高中畢業生升學率僅四%，使失學失業青年不斷增加。當前正在減少普通中學，或改為職業學校，或附設職業班。

(三)初等學校：1.五年一貫制與六年四二制；大城市和重點學校，紛紛實行六年四二制。2.全日制與半日制；因地制宜，形式多樣。3.公辦與民辦：所謂「民辦」，乃是羣衆集體辦學，也就是農村社隊辦學，並非私立學校。

中共教育改革之主要難題

(一)教育經費的短絀：一九七九年，大陸教育經費爲人民幣七〇·一一億元，大、中、小學生總數爲二·一三億人，平均每個學生得到的教育經費僅爲人民幣三二·八元。六十七年，臺灣公立學校學生的單位成本：大學工學院學生新臺幣五三、二八八元，文學院學生四四、九四八元，高中學生一三、二三七元，國中七、六七七元，國小五、三七九元。

(二)校舍設備的簡陋：1.「文革」時其他單位佔用的校舍，迄今尚未全部歸還；2.許多學校成了「鷄籠子」（「鴿子籠」）。3.有的學校利用走廊上課，沒有時鐘則以日出日落上學和放學。4.有的學校由學生自帶木板和小櫈，作爲課桌課椅。

(三)教師質量的低落：1.大學老教師「教授不教、講師不講」，新教師「現買現賣」。2.中學畢業生教中學。3.小學畢業生教小學。4.教師待遇仍低：每月平均薪俸小學教師四四元，中學教師四九元，大學教授一二〇元（人民幣）。

(四)學生素質的低劣：1.大陸學生既有程度問題，又有思想問題。2.有的學校分快班和慢班，各班仍有程度不齊現象。

結語：(一)「中共『文革』十年浩劫，大陸教育一落千丈」（蔣南翔語）。(二)「大陸教育比美國教育落後一世紀」（美國教授語）。(三)中共「文革」造成「文化斷代」、「問題叢生」，教育雖不斷改革，短期內難以普及與提高。(四)中共教育方針不改，且在各級學校加強思想政治教育，仍然「政治掛帥」，對教育的普及和提高阻力仍然很大。(五)總之，當前大陸教育拖住四化建設的後腿（中共語）。

姚孟軒先生：黨的領導與經濟的承包

目前中共想找出一個兼顧政治與經濟的道路，以求擺正政治、經濟關係，透過建設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來扭正官僚積弊。鄧小平的作法可歸結爲兩點：其一是在政治上重新建立黨的領導權威；其二是在經濟上實行承包制，搞活經濟，這是中共設想的兩全之道。

鄧小平代表改革派，一九七八年起實施經濟改革，一九八〇年又提出庚申改革方案。鄧想在政治上運用制衡，經濟上採市場經濟，走偏右或類似自由化的道路。但三年來實踐的結果，不但政治上沒走通，經濟上也出了亂子。去年「十二大」以後，中共所謂「體制改革」僅僅是限於技術性的，黨的機能並未能充分發揮。

此外，在整頓思想方面，鄧小平希望有破有立，建立一套新思想，它既非毛澤東思想，也非傳統的共產主義思想，而是鄧小平思想。同時，在人事上要新陳代謝，要重塑造德觀念和價值標準。

再者，鄧小平在政治上軟硬兼施，採用專政手段來干預經濟，打擊經濟犯罪，開放經濟領域。但這種開放是不會超越公有制

和計劃管理的兩道堤防的。在軟的政策方面，鄧小平改變知識分子政策，實行選舉制度，企圖在政治上採安撫手段，收攬人心；透過行政、教育、文化的孔道，以物質鼓勵來提高行政效率。

至於剛才洪幼樵先生提到的「鳥籠經濟」，我有一些補充意見。中共的鳥籠是可大可小的，最近趨勢則是放大。

我覺得鄧小平是個改良主義者。但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改良主義失敗後就會產生革命，例如康梁變法和俄國沙皇被推翻等。中共執行政治向左、經濟向右的矛盾政策，將會遭到不少問題。

中共將來會走向蘇聯、南斯拉夫、羅馬尼亞或波蘭的路子嗎？我以為，胡耀邦不會走蘇聯的道路。至於會不會走南斯拉夫的道路？我想也不太可能。因為南斯拉夫的狄托不僅是政治領袖，還是民族英雄，他具有某種領導權威和堅強的領導中心，但這些却是中共所欠缺的。目前中共黨的權威低落，又無堅強的領導中心。中共當前雖想樹立一套新的指導思想，它能够作得到嗎？

總結上述，未來中共的成敗關鍵在於能否在三、五年內重建黨？能否打破公有制與計劃管理的堤防？能否有效阻止自由化的浪潮？能否打通中央領導權到下層的管道？以及能否和平地移轉權力？這些都是當前中共政權的重大難題。

洪幼樵先生：農村經濟改革趨向

大陸農村在基本上實行各種生產責任制之後，現在，一個新的趨向，是在各地農村出現了各種形式的「經濟聯合體」。有一些地方，參加的聯合體的農戶已佔當地農戶總數的50%—100%，有的達到了200%，且還在繼續發展。

新的經濟聯合體的出現不是偶然的，是有其客觀經濟原因的：

1. 在農業實行各種責任制以後，農業勞動效率提高，農村有了大量剩餘勞動力。

2. 農民收入的增加使農民手裏有了剩餘的資金。

3. 但有許多事，一家辦有困難，聯合起來就可辦成。新的經濟聯合體正是適應農村經濟發展的要求而產生的。

目前，在各地農村出現的經濟聯合體是多種多樣的。

1. 從行業上看，有種植業、畜牧業、林業、漁業，也有加工業、交通運輸業、建築業、商業、飲食服務業，還有採礦業等等
2. 從聯合的項目上劃分，有專業性聯合，有整個生產過程的聯合，也有生產過程某一環節的聯合，以及產前產後的社會服務項目的聯合。
3. 從聯合的內容上劃分，有技術的聯合、生產資料的聯合、勞動力的聯合，也有人、財物的聯合。

4. 從參加聯合的單位上劃分，可分為個人與個人之間的聯合，集體與個人之間的聯合，「國家」與集體的聯合，「國家」、集體、個人之間的聯合。

5. 從地域來看，有的是在本地區內的聯合，有的是超出縣界、省界的聯合。總之，多種多樣，縱橫交錯，不拘一格。一個單位（包括農戶）既可參加這一種聯合，也可以同時參加其他項目的聯合。這種新的「經濟聯合體」開始不久，存在的問題很多，是值得我們繼續深入研究探討的。

另一個新的趨向，是中共正在摸索政社分開和綜合經營體制改革的途徑，以北平豐台區黃土崗公社為例。在農業經營展現出向專業化、社會化生產發展的趨勢之下，政社合一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已不能適應農村經濟的新情勢，現在正從實際的情況出發，摸索政社分開，農工商綜合經營體制改革的新途徑。資料顯示：他們在建了偽鄉政權，實現政社分開之後，最近在原有的經濟基礎之上，成立了黃土崗農工商聯合公司。作為農工商綜合經營的經濟聯合的實體，突破了原有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在全社範圍內建立了按專業聯合的營管理系統。聯合公司下分工商、商業、畜牧、農機運輸等九個專業公司。原有的十二個大隊，一個農場全部改為聯合公司下屬的分公司。分公司下設專業經營管理站。目前，各管理站正與所屬的專業隊、專業組、專業戶、專業人簽定聯產承包合同，把上級下達的各項經濟指標落實到每個專業隊、組、戶和勞動者，實行層層包干，層層核算。中共宣稱，這種體制，「既可以保證國家計劃的執行，又能充分調動社員羣衆的生產積極性，加快向專業化、社會化生產發展的步伐。」

目前，中共在農村中實行的各種生產責任制，正如與會各位專家學者所指出，存在的問題複雜多樣，不僅在完善各種生產責任制上困難重重，新的問題也不斷產生，而且來自中共黨內左的阻力很大；基層幹部和一般羣衆吃「富戶」，吃重點戶和專業戶，成為普遍現象；新的經濟聯合體、政社分開以後，新的體制的改革，都還在摸索的階段。而目前已經可見的嚴重後果，一是廣大羣衆已從中共的各種改革中，否定了中共的所謂「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優越性」；二是從各種改革的體驗中，深深地認識到自由經營才是發展經濟的光明大道，達到民生樂利的唯一途徑。這種思想上的變化、發展，對中共將會發生多大的衝擊作用，也是值得研究的。

趙育申先生：工業企業管理體制改革問題

目前共匪在工業企業管理體制方面進行的改革措施，主要是：在大中型「國營企業」中推動「以稅代利」的辦法；在小型「國營企業」及集體所有制的工礦企業中採行由個人或小集體承包、租賃等經營方式，實行「國家徵稅、資金付費、自負盈虧」的制度。

過去共匪採取「統收統支」的財務管理辦法，企業的利潤全部上繳給匪偽政權，而所需的支出費用亦全部由匪偽政權撥付，經營不善的企業沒有或祇有少額的利潤可以上繳，所需開支仍源源可以由匪偽政權供應，不愁倒閉，造成企業「捧鐵飯碗」、「吃大鍋飯」的依賴心理，不求改進。一九七九年經濟改革以來，採取「利潤留成」辦法，規定企業的利潤除大部上繳外，約百分

之三十左右可以作為留成，由企業自行支配，以激勵企業改善經營。但經營不善的企業仍然可以爭取少上繳或要求變更留成比例，實際上使近幾年匪偽財政收入中上繳利潤這一項收入不斷減少，不利於收支的平衡。一九八〇年共匪在少數企業試行「獨立核算、國家徵稅、自負盈虧」辦法，企業不再上繳利潤，而改為納稅，規定稅後盈利可自行支配，虧損也由企業自行負責，匪偽政權不再給予貼補，造成壓力，迫使企業改善經營管理，這就是目前共匪要推廣實行的「以稅代利」辦法。

共匪宣稱「以稅代利」辦法的主要好處有：(一)納稅具有較高的法律強制性，企業不及時交納稅金將受到懲罰，每遲一天需要多付千分之五的滯納金，增加企業的壓力，有利於保證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二)匪偽政權通過稅種、稅率的訂定，可以調整分配比例關係，彌補由於價格體系不合理所造成企業之間利潤水平高低懸殊、善惡不均的偏差，足以發揮企業及職工的積極性，增強改善經營的動力。(三)「以稅代利」辦法比採取「利潤包乾」辦法簡便易行。(四)能真正體現「國家得大頭、企業得中頭、個人得小頭」的原則，進一步擴大企業自主權。

然而，據已試行「以稅代利」企業反映，「以稅代利」辦法存在着下列主要問題：(一)如何公平合理地確定稅種、稅率？是一問題。過去共匪在試行中除了徵收企業所得稅之外，還徵收企業收入調節稅，造成「生產長一分、稅金長一分」的結果，企業得不到實惠。(二)共匪財稅部門為了減輕工作量，往往以專業公司作為核算徵稅的對象，而不是以其下所屬的幾十個工廠為單位，祇是從「吃大鍋飯」變為「吃中鍋飯」，公司責任小，有權有利，工廠責任重，却權小利少，不能調動職工的積極性。(三)規定職工全年的獎金不能超過二、三個月的工資額，工廠盈利多，獎勵基金多，也不能分給職工，被指為是「櫥窗裏的蛋糕，看得見吃不着」，引起職工心理的不滿。

目前共匪宣稱工業企業有三十八萬多個，屬於「全民所有制」的匪偽「國營企業」共八萬四千多個，其中大中型的祇五千個，其餘七萬九千多個都是小型的。集體所有制的企業共二十九萬六千多個，其中主要是「社辦工業」，共十八萬五千多個。在匪「國營企業」中虧損的約佔總數的百分之三十，年虧損額高達僑幣四十億元以上。集體所有制企業的虧損情況未見報導，料想比匪「國營企業」更為普遍。多年來共匪要求企業「扭虧轉盈」，但是情況未見好轉。目前共匪對這些長期虧損的企業採取由個人或小集體承包或租賃的辦法，就是想通過承包合同或租賃合同把賠累的包袱扔掉，規定這些企業可以自定經營計劃，自找原材料，自銷產品，並在一定限度內自定價格。這一改革顯示匪「國營」及集體所有小型企業，技術落後，經營不善，捧鐵飯碗、吃大鍋飯，養了一大批懶人、懶企業，造成長期嚴重的虧損，這一條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道路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不得不改弦易轍，走上改由私人經營的道路。

承包、租賃制存在的問題主要如下：(一)承包或租賃的代價不容易適當訂定，代價太高，無利可圖，沒有人敢承包，代價偏低，使匪偽政權受損失，基本條件太差的爛企業也沒有人敢承包，因而這一改革辦法推動不易。(二)承包人在簽訂合同以後，必然要

對承包企業大力進行整頓，裁汰冗員，減少浪費，掌握人事、財務、經營等權力，成為沒有資本却大權在握的企業新主人。如果企業獲得盈利，承包者可以分得較多成數，佔有較多的剩餘勞動，與社會主義消滅剝削制度的要求背道而馳。(三)被裁汰的企業原有的吃閒飯的、技術體能差的人員，失去職業，造成社會問題。(四)承包企業為了解決生產所費的原材料、動力、推銷產品等問題，必然出現採購人員、推銷人員滿天飛的情況，拉關係、走後門，助長經濟犯罪活動。(五)為了追逐利潤，企業之間互相競爭、排擠、技術封鎖的現象加重。(六)承包合同有一定的期限，承包者為了節省費用，提高利得，必然採取掠奪性的經營方式，不注意生產設備的維護保養，加重損耗折舊，礦產資源遭到破壞性的開採，資源利用率降低，機器設備得不到更新。(七)承包企業職工的勞保、福利、退休等問題難以解決。(八)個別承包者如經營得法，有可能迅速致富，受到匪幹的妬嫉、打擊，輿論及羣衆的歧視、眼紅，承包者怕一旦政策改變又會成為清算鬮爭的對象，疑懼重重。

總括說來，共匪推行「以稅代利」是企圖保證財政收入，承包制或租賃制是想擺脫企業的虧損，減輕財政貼補負擔，企圖挽救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經營效益低、財政經濟情勢不斷惡化的危機，打破「捧鐵飯碗」、「吃大鍋飯」那套舊框框，破除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實行多勞多得，但是由於共匪強調「國家得大頭、企業得中頭、個人得小頭」的原則，實際刺激作用有限，推行中已出現許多問題，情況相當混亂，改革的前景如何？經濟效益能由此提高？財政經濟狀況能否有所改善？均堪存疑。而承包、租賃制的推展更將動搖社會主義公有制及消滅人剝削人的理想，有可能引起社會制度的質變，這些發展情況是很值得我們繼續注意研究的。

鄧辛未先生：中共的商業改革

一九八三年二月三日中共商業部通知各省市商業領導部門，要把推行商業承包責任制作為商業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上半年試點，下半年鋪開，務求年內有個較大的突破。通知指出：(一)商業改革要抓住自己的要害，採取切實的改革措施。不能新政策，老辦法，不能穿舊鞋，走新路。每個部門都不能例外。(二)改革要能出效益、出速度、出財源、出人才、出精神文明。(三)商業經營承包責任制在一個城市不能只搞幾個點、幾個街，只有少數單位搞，頂不住風。(四)經營承包責任制這一改革，第一要保國家財政收入。在這個情況下，誰多收誰可以多得，誰先改革好了誰可以先得。國家得大頭，企業得中頭，職工得小頭，多勞可以多得。否則這一改革就會夭折。(五)商業今年的重點是抓改革。要一片片、成片成片地推開。一般商店年內都要完成實行承包責任制的任務。但是，如誰打着改革之名，從中作弊，使國家受到損失則要追究責任。(六)商業改革的目的在發揮城市商品流轉樞紐作用，組織好城鄉物資交流，促進全大陸經濟的開發繁榮。逐步改變城城分割、少渠道、多環節的狀況，按照合理流向組織商品流通，實行城鄉通開商品分工、多渠道、少環節的新體制。工商通力協作，廣開商路，有重點、有目標地在各地建立商品銷售基地，進一步打開各地產品的銷路，復活農村商品流通，加快農村基層供銷社體制改革的步伐。城市要充分發揮商業中心、外貿中心、信息

中心和金融中心的作用。(七)把開發人才作為發展經濟的一項戰略任務來抓。(八)中共商業改革的目的主要是把國營經營商店由職工承包，虧損不補，利潤留店，工資浮動。

市場作用在現代經濟生活中是無法抗拒的。誰違背了市場規律，誰就會破壞經濟的自然運作。中共只有放棄那個僵化的共產主義經濟制度，學習進入自由市場經濟，搞好市場經濟，才能脫離貧困的惡性循環。何況市場是生產和流通的重要渠道，通過它才能測量出一切經濟活動的容量和氣候，才能比較正確地求得社會的供求和需要的基數而使其平衡。但怎樣才能把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很好地配合起來，却是中共需要解決的問題。

裘孔淵先生：中共實施全面改革的重大阻力

中共實施全面改革的阻力，其重要的一方面來自共軍。共軍中極左思想本極頑固，現在，具有作戰經驗的老幹部和「文革」中竄升起來的新幹部，都對軍隊體制改革即「國防現代化」、「軍隊正規化」心存抵觸，盡力抗拒。部隊流行着這樣一首順口溜，反映了抗拒改革的心態：

「三老上神枱，三洋下部隊，老九搖筆桿，老八拿槍桿」。「三老」指老紅軍、老「八路」、老「解放」；「三洋」指洋槍、洋砲、洋編制；「老九」指知識分子；「老八」係指「黑九類」中，除去「臭老九」之外的八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務、走資派」，他們的子弟已進入了共軍，使部隊的階級屬性業已變質。這一種心態所產生的影響，值得注意。

吳安家先生：中共全面改革的阻力

(一)共產主義的理想與現實脫節所帶來的阻力：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想，共產主義運動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平等而沒有剝削的社會。但三十多年的實踐檢驗證明，中共變成一個欺壓人民的新階級。中共統治大陸三十多年，無論在經濟領域、政治領域和思想領域等方面出現了異化的現象。周揚在「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一文中指出，經濟領域的異化如過去所謂「社會主義的建設」缺乏經驗，幹了不少蠢事，結果自食惡果。政治領域的異化如民主與法制的健全，人民的公僕濫用人民賦予的權力，轉過來做人民的主人。思想領域的異化如個人崇拜和個人獨裁，這和費爾巴哈批評過的宗教異化有某種相似之處。這些異化現象，有些正在改革，有些仍未見改善，如缺乏民主與法制的現象，並未獲得改善。

(二)左傾思潮所帶來的阻力：如幹部怕農民變富，過去所謂「富則走資」、「富則變修」的思想仍然存在。再如輕視知識份子，亦即中下層幹部怕知識份子抬頭，搶掉他們的飯碗。他們甚至擔心「知識份子成堆」後對他們所造成的影響。

(三)對外開放所帶來的阻力：中共對外開放後，資本主義世界的思想、制度和生活方式對中共幹部和大陸人民所帶來的衝擊，使共產主義思想搖搖欲墜。換言之，中共需一面堅持共產主義的思想教育，批評資本主義思想、制度和生活方式，一面繼續採取

對外開放的政策。

(四)來自外來思想的阻力：如蘇聯農業集體化的影響仍然存在，阻礙了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大陸有一位學者蘇紹智在「在全面改革中發展馬克思主義，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文中指出，中共要實施全面改革，必須拋棄一些些受外國模式影響的制度、規章、習慣做法。他所指的外國模式包括毛澤東學自史達林的農業集體化。

邢國強先生：中共全面改革之評估

中共全面改革的內涵，已有多位先生從不同的層面加以探討，本人僅就下列數點，加以評估：

(一)關於全面改革本身的制度問題。根據一般政治的看法，提出一個制度的首要條件，是這一制度必須具有法律上的獨立性，以及足以完成這一制度的功能。其涉及全民利益者，還要能滿足各方面的需要。從這個觀點來分析中共全面改革的措施，我們可以看出除了在滿足人民若千需要的條件方面略有作用外，實在看不出這一改革能有獨立的功能與長期的持久性。因而，我們對中共全面改革的看法，只能認為是一種戰術上的措施，而缺乏戰略性。

(二)其次，從中共本身的理論來看，雖然胡耀邦在解釋全面改革時曾說，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而不是後退。但事實上，全面改革中重視私有個體經濟等，不可諱言的是一種「後退」，如何在理論上自圓其說，中共迄今沒有一種具體的說法。共黨說「理論是行動的指南」，而全面改革的指南，並沒有建立起來，因此，亦祇能說是一種臨時的措施，而無長久的前途可言。

(三)正因為全面改革並不是各制度的永久性與理論的堅強基礎，因而在中共幹部中，很明顯的表現出一種茫然的心態。而鄧胡等當權派方面，則以全面改革作為權力鬭爭與解決若干經濟問題的一種方法。另一方面，由於經濟上採取若干開放的措施，而引發了人民對私有的慾望，最後的結果是：如果全面改革成功，則人民物質要求愈高，民主要求愈強，最後難於收拾。如果失敗的話，又將出現第二度的高壓政策。在此兩種情形下，實不可能有好的前途。

陳雨晨先生：背景、阻力以及評估

我想個人就整體觀念來探討一下中共改革的問題。從討論的大綱來看，首先就是改革的背景。中共背上馬列主義的枷鎖後，毛澤東指導思想的錯誤，最突出的表現在：以階級鬭爭為綱，其次為認為戰爭不可避免。由於以階級鬭爭為綱，結果產生以綱治國的政策：政治掛帥。由於認為戰爭不可避免，結果產生了深挖洞、廣積糧、發展核子武器的一系列錯誤作法。因此造成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發展結構的扭曲與內外情勢的危險。這表現在內部是政治上脫離羣衆，三信危機嚴重，經濟上瀕臨崩潰的邊緣。表現在外部是「貧窮落後，窮兵黷武」，如果不改革便有「亡黨亡國」的危險。

中共這次的改革是全面的，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各方面，由思想理論到制度政策都有相當幅度的變革。改革的中心思想是：(一)從社會主義革命轉化為社會主義建設。(二)從階級鬭爭轉化為撥亂反正。至於其策略的轉變可以歸納為五大內容

：(一)從盲目發展到重視國情。(二)從重點突出到平衡發展。(三)從急於求成到穩步漸進。(四)從閉關自守到對外開放。(五)以實用代替教條，以彈性代替僵化。改革的具體安排有三個：(一)修正憲法。(二)提出二十年經濟社會建設目標。(三)提出第六個五年計劃。所有的改革內容都涵蓋在以上的安排中。這個改革的特性是納吞、模仿、揚棄。也就是擺脫俄式經濟模式，吸取東歐市場經驗，引進美式企業制度、仿效日本發展作法、學習臺灣成功經驗。用鄧小平的話說就是要摸索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改革的阻力來自四方面：(一)政治上四個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領導、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二)經濟上二個堅持：搞活與開放的堅持。搞活不能丟掉共產主義，開放不能放棄政治鬭爭。(三)發展上一個模式：鳥籠模式，也就是所有的改革和搞活都限定在一個範圍之內。歸納起來，有十大制約因素：(一)政治干擾經濟；(二)社會缺少動力；(三)政策無法落實；(四)生產意願低落；(五)左傾思想阻擾；(六)官僚主義嚴重；(七)行政效率太差；(八)缺乏法律規章；(九)失業人口日增；(十)上下信心不足。

我個人對這次的改革作一不成熟之評估：(一)改革孕育著資本主義成份，潛伏著亂的根源，結果是混亂、反覆、曲折、停滯充滿著整個改革的過程。(二)改革的結果是思想意識與價值觀念發生變化。結果是「三症併發」，即蛻化變質、三信危機和平演變。未來有三種可能的情況，就是突破、失敗、黯淡。失敗的機率佔百分之二十左右。如果失敗，大概是十五至二十五年的時間。這是海外民主運動領導者王炳章答覆記者時的估計。突破的機率也佔百分之二十左右。如果突破，也要二十至五十年的時間。這是胡耀邦自己在創作會議上的估計。黯淡的機率佔百分之六十。所謂黯淡是指低度開發、緩慢成長。但是如果外來的衝擊，這種情勢也可能急轉直下，出現另一種局面。

九、主席結論：

鄧胡政權推行改革，牽涉極為廣泛，從背景、內涵、困難及展望各種層面，我們已作了詳盡分析，以下幾點似尤其為同仁所重視：

(一)一個政權必須進行「全面改革」，基本原因乃是由於長時期導向錯誤。

十億中國人三十年時間，付出慘重犧牲，用作共產主義在中國實驗的代價，結果發現必須「全面改革」，代價之重無與倫比、史無前例。其實此種嘗試並非必要，早在民國十二年 中山先生與趙飛共同宣言中，已明白指出：共產主義並無在中國推展之必要及背景，越飛且表同意。在宣言四要點中，上述意見乃為最重要最基礎觀念，中山先生深思熟慮，基於中國文化傳統、人類自然需求，作此明白提示，惜被表裏不一的詐術所欺。後知後覺者，不知不覺者，如能誠意地虛心接受先知的指導，何必再有此種實驗？何必再讓中國人作此犧牲？

(二)「全面改革」的關鍵，似乎寄厚望於各種「責任制」。

「責任制」的基本理論，無非是「以報酬刺激生產」，透過責任制，彈性的報酬制度，以期鼓勵工作意願、提高效率。這一

理論，是自由經濟理論，不是共產經濟理論。共產社會「吃大鍋飯」平均主義，顯然消失了鼓勵社會積極向前的「動力」，三十年來竭盡全力要尋找可替代的「動力」，「生產競賽」、「英雄典型」、「政治壓力」都未奏功。共產政權已嘗到了苦果，被共黨所控制的人民也吃盡了苦頭，今天要以自由經濟理論，作為全面改革的主軸，挽救三十年錯失。實則「彈性報酬」之說，人類採取甚久，對於長期受囿於馬克斯理論的鄧胡輩，似乎是一大發現。

(三)鄧胡政權推展改革，最主要困難在「堅持」

「四個現代化」的構想，是求變。在變的過程中，發現共黨政權將會因四化而蒙受嚴重動搖，於是提出「四個原則的堅持」，「堅持」者即是不可變。這樣，共黨政權陷入在「變與不變」的矛盾與衝突之中。現在，鄧胡提出「中國式社會主義」構想，其內涵即是要「在四個堅持的基礎上推展四化」，希望能調和四化與四堅持之間的矛盾，解除困擾，維護共黨政權的既得利益。共產社會中，共黨要包辦一切、代辦一切，制度剝奪了人民發揮智慧的機會，這是個死結。中共現憲序言中肯定地強調：「中國人民今後將繼續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在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路線……」。四個堅持其實是「一個堅持」，共黨「堅持」不願解開這個制度的「死結」。所稱「改革」，不能觸及這個扼殺人民智慧的程度，這就是最大困難之處。

(四)「改革」已深入到意識層次。

「十二大」時鄧小平提出「四個工作重點」，大體已顯示出「全面改革」若干動向。其中第二個重點：「建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這一重點有其特殊背景與因素，在信仰、信心、信任都動搖的時候，社會規範已經失落，積極精神已經消失，希望能有新的意識可以替代。

「全面改革」中，機構方面、經濟體制方面已為一般所注意，更重要的一部份，「改革」已提升到「意識型態」層次，這應是更需注意之處。假如信仰、信心、信任不產生動搖，「渺茫論」不出現，鄧胡等不會痛苦地從事意識的重塑。

(五)密切注意發展情形

三十年錯誤，促成了此次全面改革，這次改革的影響自屬極為深遠。

彈性報酬制度，可以出現若干程度的活潑。

以共黨利益為着眼的四個堅持，又將扼殺此種活潑。

今後是否鼓勵彈性報酬原則繼續發展？抑或發展到某種程度即被四個堅持所封殺，這是注意的焦點。

共產黨人如不能明智地體認全民政治的重要性，如不能開濶地排除「專政」、排除「唯一真理」、排除「寡頭利益」，而我約束於、陶醉在此種狹窄的意識封閉之中，改革的前途難有樂觀的依據。

謝謝各位！